

0410

襄汾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襄汾文史资料

第八辑

政协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八月

政协襄汾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 问	孟 精 华	贾克勤
主 任	杨如茂	
副主任	邱文选	橄登岳
	武玉兰	
委 员	狄西海	李文炳
	刘润恩	毛汇川
	王文志	

主 编	杨如茂
副主编	武玉兰

目 录

毛主席给我改文章.....	王耀庭 (1)
襄陵县牺盟会初期活动片断.....	孙觉民 (4)
发生在干七分校的一次学潮.....	曹瑞璜 (7)
少年往事.....	史 骥 (11)
国破家难临头时.....	史 骥 (18)
我参加国民党青年远征军的经过孙海庆口述 王勃生记录 (24)	
“惠民壕”带来的灾难邱文逸 毛敏之 王勃生 (26)	
忆夜战鸽子岭.....	张文炎 (28)
山西“复省兵团挺进队”侦破始末刘学龄口述 郭思俊整理 (34)	
兴传统美德 正社会风气 襄汾县社会公德三字歌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37)	
山西襄汾籍外交家——原涛.....	(41)
“山西娃娃”——老红军王东平刘吉玲 石耀辉 杨如茂 (42)	
胡西安传略.....	李子云 高树帜 (45)
冯玉松传略.....	秦书元 (60)
李光斗传略.....	秦书元 (63)
毛从周轶事一则.....	高树帜 (65)

赤心为党工作的无名英雄席兔娃·····	王勃生 (67)
励精图治的晋襄公·····	邱文选 (68)
晋国革新重臣——赵盾·····	邱文选 (71)
战国名将李牧·····	邱文选 (75)
张良不愧为人杰·····	陈少楨 (78)
“白波黄巾”领袖郭大·····	邱文选 (81)
达连大师与洪洞广胜寺琉璃宝塔·····	杨如茂 (83)
我上私塾·····	孙觉民 (84)
忆三位高小老师的教风·····	高树帜 (88)
襄汾籍高级教师集·····	武玉兰 (92)
贺志言及其画风与悲剧·····	高树帜 (108)
装裱字画工艺散记·····	高树帜 (110)
广才多艺的段玉龙·····	杨如茂 武玉兰 (113)
“漫画家”芦林·····	侯全继 (116)
令伯村转身鼓在省乡文队·····	邵思俊 (118)
蒲剧三位著名艺人的特技与诀窍·····	高树帜 (120)
漫忆荀董村的“家戏”·····	高树帜 (124)
建国初期农村兴起的演戏热·····	曹瑞璞 (127)
襄汾文物古迹概述·····	转载自县志 (129)
关氏创修墓志铭·····	梁高凤撰 (149)
“晋桥梅月”漫忆·····	乔耀增 秦书元 (154)
重游丁村民俗博物馆·····	梁明 (157)
丁村文化遗址发掘前后的挖沙工人·····	赵相如 (161)
钱币漫叙·····	杨如茂 (166)
这个谜揭开了·····	曹瑞璞 (171)
蒲剧刘家的转变·····	王成惠口述 王耀庭整理 (175)

原襄陵地区水利散记	秦书元 (179)
昔日泰山庙祈雨	曹瑞璜 毛汇川 (183)
邓庄地区麻纸生产工艺及品种演变	
.....	乔泉发 郭占荣 (187)
镖师杨佛汉的传说	景思闵 (191)
闲话昔日拦车	景思闵 (193)
襄汾(襄陵、汾城)县人口历史资料	李学义 (197)
书 讯	编辑部 (205)

毛主席给我改文章

王 耀 庭

1955年的下半年，中共中央为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更扎实、更健康，从各省市自治区推荐的有关材料中，选择了176篇文章，汇编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这套书的主编是毛泽东同志。所有选择出的文章，毛主席都要亲自审阅、亲自修改，其中有102篇文章他老人家亲自写了按语。这年我在共青团晋南地委担任秘书工作，曾为我们机关创办的《学习资料》写了一篇关于解虞县（现永济县）西张耿乡农业技术夜校的材料。这个材料由团省委呈报给中共山西省委，省委审阅后推荐到毛主席那里了。经毛主席修改并加了按语，编入该书上册165页。文章的标题是《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

1956年2月，在这套书发行之前，我接到新华书店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上中下三册一套赠送本。我拿上书本上修改过的文章，同原材料对照，全文5000多字，就有14处作过修改。其中影响最深对我教育最大的是三处。

一、不能偏面责怪农民。原材料有这样一段事实叙述：有几位年纪大的农民，他们不相信棉花合理密植能增产，悄悄拔稀了已经定苗的棉苗。农业社的技术股长很生

气，把这几位老农叫到农业社办公室，狠狠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是成心捣乱，专门和科学种田唱对台戏，老农不服气，双方争吵不休，最后结局是，技术股长不许他们再进棉花地。毛主席把这段叙述给删掉后，加了这样几句话：

“老农拔稀了棉苗，还有理似的说：‘留这样稠还不坏事吗？’。经他这么一修改，既说明老农拔稀了棉苗是不对的，也说明老农的用意也在增产，并非捣乱或唱对台戏。不应当偏面责怪老农，只能怪我们推广科学技术不到家，农民不相信合理密植能增产。使我又一次看到他老人家的群众观点事事处处表现的多么显明而突出。

二、突出了用事实教育人的方法。原材料上有这样一段叙述：东张耿农业社有几个在技术夜校学习的青年，学会了棉花根外施肥的道理，回到村里找农业社长要求在棉田里实施，社长不答应，青年们再三讲道理，社长听的不耐烦，说他们是胡闹。原材料上这段叙述过长，尤其是青年们讲的那些道理，叙述的过多。事实上，社长满足种田老经验，青年们讲的道理社长听不懂，也不去耐心听。最后还是乡党支部书记把这位社长领到别村棉花地里，让他看了棉花叶面喷磷的棉苗长势，这位社长才口服心服的说：

“我回去马上叫这伙年青人干就是了。”毛主席对这段材料是这样修改的。他把青年和社长的话删去大半，突出了青年们将情况汇报到团支部，团支部书记综合了各农业社的情况后请示党支部，由党支部书记用事实教育农业社干部相信科学种田能增产的道理。用事实教育人的方法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这已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三、对青年一代抱有极大希望。原材料末尾是用青年

的反映作结束语的。原文这样写道，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吸引着青年们，激发着他们如饥似渴的学习技术的热情。他们说：“咱们现在是农业合作社的小组技术员，再过几年咱们这里就成了高级社，那时，说不定咱们成了高级社的农学家哩！”我想，毛主席看到这里一定是很高兴，所以他拿起大笔写了这么一段既是对青年人的回答，又是鼓舞青年人的壮言豪语，“这理想，已经不是不可捉摸的遥远的未来，而是不久一定要实现理想了！”

毛主席修改完这份材料后，在材料的前面写了91个字的按语。其中第一句话写道：“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最少是大多数的乡，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

事情已经过了38个年头，每当我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修改文章，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荣幸和鼓励。我也想到，我们党曾有过这样的领袖，一位心怀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奋斗终生，以他自己的模范行为塑造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共产党员，带领着全国人民创造了空前的丰功伟绩，这是我们党的光荣和自豪。他老人家的一言一行，永远铭刻人心，永远是我们党的光辉榜样，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襄陵县牺盟会初期活动片断

孙 觉 民

1937年1月，省牺盟总会派村政协助员苏宇涵、张天斯等来襄陵县，驻南街初级小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救亡宣传，局面很快打开。这时我就读的县实验小学已放寒假。南街小学在我家门口，所以很自然地被抗日救亡宣传火热的声势所吸引。我们晚上在小学教室里学习时事，讨论形势，白天到街头及附近村庄宣传，刷标语、画漫画、散传单、讲演、表演唱歌。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我国东北、热河，正阴谋搞“冀东自治”，并把矛头指向察绥，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宣传内容是揭露日本侵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罪行，宣传绥东抗日军民一举收复战略要地百灵庙的胜利；宣传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鼓舞群众斗志。就在这时，我正式加入了牺盟会组织。

在救亡宣传中，有一次难忘的文艺演出。演出是由襄陵县牺盟会组织并直接领导的。时间在1937年2月，即民国二十六年正月中间。地址在襄陵南街南寺戏台（在学校内），演出两个独幕话剧（《东北之家》和《绥东之夜》）及几组歌舞节目。我在《绥东之夜》中饰演一个小学生（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小少爷）。这出话剧反映的故

事发生在当时绥东某地，日本侵略军妄图占领该地，有个地主兼资本家打算投降日军，作为内应，正当他与日伪勾结时，他的小儿子洞察其奸，突然出现，当面揭露父亲的罪恶行径，并揭示其严重后果。小学生的戏并不多，台词也就那么十来八句，但却是个关键人物，在这特定情况下，他一番大义凛然的陈词，把他父亲说得闭口无言，由尴尬而羞愧，而幡然悔悟，从而把戏推向高潮。

这次演出的节目都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现实意义，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演出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原先牺盟会的领导和村政协助员担心话剧在本县初次演出，怕群众接受不了；又担心我们都是第一次登台，怕压不住阵脚。想不到只匆忙排练了几天就上台露演，连续三场（三个夜晚），场场爆满，观众有数千人，方圆二十里地的村民也来观看演出，有的竟一连看了几次。

我当时只是个十来岁的学生，腼腆得象个小姑娘，见生人说话还脸红，别说上台演戏了。这次出现在稠人广众面前，自然非常胆怯，但由于平时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特别是救亡宣传实践得到的启发鼓舞，经过导演一点拨，竟感情迸发，把这几句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台词，说得铿锵有力，打动人心，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学校老师看了演出，还对我大加夸奖了一番。

这次文艺演出，对襄陵城乡抗日救亡活动是又一次发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各阶层群众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几十年后，当我回乡同老一辈谈起这次演出，大家记忆犹新。

关于襄陵县牺盟会初期活动，我应该补充订正这么一

个事实，《襄汾县志》、《中共襄汾地方史稿》和一些同志的回忆都说：襄汾县牺盟会成立于襄陵县城关南寺，中共襄陵县委创立于襄陵城关南寺。这里说的南寺，准确地说应该是南街初级小学校。南寺位于襄陵城关南街煤园坡（现为新建的商业街）座北朝南，这里是佛教寺庙，殿堂巍峨，庭院幽静，主持和尚图静和其它僧人驻此，平时很少有人往来。南街小学则是南街公立学校，校舍有从南寺划出一部分房舍，也有新建的教室，是一个独立建筑。襄陵县牺盟会从成立到撤出县城一直驻此。襄陵牺盟会特派员纪锦章就工作生活在这里。中共襄陵县委也组建于南街小学，而不是在南寺。

发生在干七分校的一次学潮

曹 瑞 璜

当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1938年）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燃起了对日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人民纷纷踊跃参军，抗日部队不断迅速扩大，随之而来，部队干部特别是基层军政干部的补充来源便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为适应形势需要，山西当局决定在所属部队中建立一个成套的培养基层干部的教育体系。即战区建立“第二战区随营军政干部总校”下属各军（独立师）各建立一个分校。学员在分校毕业后再到总校集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各返原部分配工作。

军政干部第七分校系晋绥军教导第二师创办。1938年夏建校，初始驻于距离师部驻地窑台头（今称台头）东三里许的石灰窑（村名）。校长阎锡山，副校长彭毓斌（师长）教育长温怀光（师参谋长），但实际负责校务者还是大队长武直刚。学校设两个队，一队为军事队，二队为政治队。学员约200余人。军事队学员由连队从战士中提拔选送；政治队则面向地方公开招生。由于地理关系，投考学员百分之六十来自豁都峪口外南北两边的汾城和襄陵两县。

战时学员年龄和知识结构都比较特殊，参差不齐，年

龄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大的有二十六、七；文化水平低的只有高小毕业，高的有初中、高中，甚至大学程度。当时我是属于小而低者（十五虚岁、高小文化）。

开学不久，部队便因调整防区从鄱都峪开赴马壁峪布防。学校跟随师部经过汾城县的候村、膏腴，沿着姑射山麓转移。就在行军途中，我们政治队新来了一位政治指导员（也许是政治教官记不准）叫王卓如。他仪表堂堂，英俊潇洒，口齿流利，看上去就知道是个有作为的青年，他对同学们热情、亲切、吃喝休息处处关怀。特别是他灵活多样的政治鼓动工作，对尚不习惯于军营生活，第一次负重行军的青年学生减少了不少疲劳，大家忘却了辛苦劳累，始终保持着饱满精神与欢乐的情绪。

不知什么时候，同学们中传着一条小道消息，说他过去在太原曾经领导过工人运动……。

到达目的地，师部住在八宝宫（后宫），学校住在五龙宫（前宫）。安顿好生活，继续开课。这里学习环境较之石灰窑好了许多。王指导员代着我们的政治课。内容有抗战理论、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基础性知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讲课道理阐述得透彻、清楚，语言表达得通俗、生动。既具有说服力，又富有吸引力，同学们非常喜欢听他讲课。他的渊博知识、卓越才能，高尚品格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仰和爱戴。小而低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总觉得他爱国、爱学生、讲得好、说得对，佩服他。至于他讲话中带有什么政治色彩，含有什么阶级观点，站着什么党派立场我一丝不懂。

渐渐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每逢他给我们上课，

窗外总有队长们的身影在晃动，看来他引起了校方的密切注意，他被人家暗中监视了。

一天，他来上课——最后的一课。他严肃地站了片刻，然后愤然地说：校领导说他是共党分子，宣传赤化，煽动学生，要他马上离开，他是来向同学们告别的。这话简直是一声炸雷把大家惊呆了。接着是激动和愤怒，一致表示：不能让王指导员离开！全体政治队学员立即举行集合，推举牛树檀（注）、冯应梦为代表向校方请愿，挽留。

当天晚上，照例在大殿台阶前集合点名，可今天情况变了，从军事队调来十几个班长，个个荷枪实弹，上了刺刀，在场子周围布了岗，气氛显得十分森严、紧张，大家的心情象铅一样沉重，甚至有些害怕。屏住气，等待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一会，校领导出显在台阶上，代表也由武装学员押送到一旁。领导讲话，历数了一些“罪状”之后，问，是谁选他们当代表的，这群刚从农村中来，没有严密组织，缺乏斗争锻炼的莘莘学子在明晃晃刺刀威胁下有谁还敢吭声呢！

第二天，校部贴出了开除牛树檀、冯应梦的通告。场学潮在武装镇压下平息了。

随着年龄增长，认识水平的提高，以后的日子里回忆起这件事知道老谋深算的阎锡山还在口喊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暗中搞反共反进步的两面手法了。这支当时被称之为“新军”的教二师其内部反动势力觉察到气候适宜也蠢蠢欲动向进步力量发起挑战 and 排挤。

这场学潮是进步与反动力量的斗争，是知识青年同顽

国军官之间的斗争，也可以看作是晋西事件早在1938年就发出的一个小小信号。

注，牛树檀，又名乐园，襄汾县南贾镇东牛村人，山西大学毕业，生前在太原市晋祠文物管理所工作。

少年往事

史 驥

(一) 一次失败的学潮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我十三岁时在襄汾县立邓庄第三高级小学上二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到暑假就要举行毕业会考，按当时乡村人说，一取得高小毕业文凭，就相当于前清时代的秀才了，这年三月中旬在邓庄高小发生了一次学潮，是以毕业班的三名优等生，梁文忠、史家驥、史九畴和另一个叫王建邦的学生为首闹了一次学潮，原因是这样的，学校有一名“公民”课的教师，叫李治安，他原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到运城师范上了三年师范，毕业后，回到学校任教，他不担任主课，只担任“公民”一类的辅课，他的教风很不好，常打学生，有时打得很厉害，虽然不曾打过我们几个优等生，但我们都看不惯他的作风，对他打学生非常不满，于是便想在毕业前把他赶出学校，为被打同学出一口气，也为学校保持一股正气，由于幼稚无知，办事单纯热情，不知分析主客观形势，制定相应口号和行动方案，心想只须组织同学们手持武器（板凳腿）把他赶出学校就完了，那知就在一些同学上房顶拿平时散落在房顶上的板凳腿时，被名叫“好管”的校役看出了问